

一經學研究

第二輯一

經學與建國

于春松 陳壁生 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一經學研究

第二輯一

經學與建國

于春松 陳壁生 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北京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經學與建國/干春松, 陳壁生主編.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 11
(經學研究; 2)
ISBN 978-7-300-18187-5

I. ①經… II. ①干…②陳… III. ①經學-研究-中國 IV. ①Z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237472 號

經學研究 第 2 輯

經學與建國

干春松 陳壁生 主編

Jingxue yu Jianguo

出版發行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關村大街 31 號	郵政編碼	100080
電 話	010-62511242 (總編室)	010-62511398 (質管部)	
	010-82501766 (郵購部)	010-62514148 (門市部)	
	010-62515195 (發行公司)	010-62515275 (盜版舉報)	
網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網)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東君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155 mm × 235 mm 16 開本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張	15.25 插頁 2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數	245 000	定 價	39.00 圓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前 言

本輯主題“經學與建國”，旨在回顧一個問題：晚清民初，面對中國從帝國轉向民族國家的局面，康有為、章太炎等人如何憑藉經義，提出他們的建國理念。

以辛亥革命為轉捩點，中國的政治組織形式，從帝制走向共和。這種政治上的革命，已經不再是二千餘年經常發生的改朝换代，而更像古代意義上的“革命”，必須“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禮記·大傳》）。簡言之，真正的革命，不僅是“王者異姓受命”，而且更需要聖者改制立法，創立一套新的制度。相應的，經學的傳統形態，已經不再“天經地義”，而是漸成前王之已陳芻狗。

自晚清開始，廖平、康有為、章太炎等治古學的學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重新開始經學研究。經過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學術積累，他們在“明經”上已經不像清初顧炎武一代那樣困難——畢竟，十三經基本上都已有超邁前代的新疏。但在“致用”上，當時代已經開始天崩地裂，經典也不再天經地義，以往的考字明義，漢注新疏，也不再滿足時代的需要。晚清民初經學研究的最大轉變，就在於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回到東漢還是西漢，講究考據還是義理，弘揚漢學還是宋學，而是直接把經學作為一個整體的義理系統進行思考，以回應中國正在發生的政治大變局。

那麼，他們考慮的首要問題，為什麼是“建國”？或者說，為什麼國家建構問題，會成為晚清民初經師的共同關懷？經學關注普遍人性、個體道德，但不是從個體的立場上，而是從共同體的立場進行關注。共同體是由每一個個體構成的，卻又不止是每一個個體的機械疊加。因此，經學極其關注共同體賴以形成的規則，以及這些規則如何有效地塑造個體的德性。而現代政治組織的基本形式中，最大的共同體已經不是帝制下的朝廷，而是構成“世界”的“國家”。倘若沒有鑄造一個追求美好德性，能夠教化

國民，讓國民感到幸福的國家，那麼，無論這個國家表面上多麼強大，始終是率獸食人的蟲豸之邦。因此，探討國家共同生活的塑造，成為晚清民初廖平、康有為、章太炎等人的共同關懷。

當然，廖、康、章所憑藉的思想資源不同，這使得他們對建國之路的設計也不盡相同。廖子、康子將經學理解為萬世不易的價值，因此更多地考慮價值如何通過制度降落在新的政治建構之中。康子最終將孔學落實為孔教，開啓了現代社會的國家教化議題。而章子則在清人章學誠“六經皆史”的基礎上，將經學轉化為“中國”的歷史源頭。有些西方人類學家喜歡說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仿佛民族國家的形成是憑空天降的，而漢學家甚至倡導“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仿佛歷史的軌跡未曾指向今天與未來。章太炎將現代國家視為一個有機整體，“國史”就是一個國家對昨日的記憶，人無記憶即不成其為人，同樣，中國忘卻國史也便不成其為中國。廖、康、章諸人的經學思想不同，以經義濟世的路徑也不同，但都指向國家建構問題。

在接下來的歷史中，接連發生的革命把中國前進的方向扭到了另一個軌道。直至今天，對中華立國之道的探索，仍然未曾止歇，而問題已經轉化。百年來，中國總是眺望遠方，以外在的標準來要求自己，難免削足適履；到現在，中國需要審視自己。尤其是面對國家道德資源的虧空，在認識自己之前要先回顧我們曾經的歷史。正因如此，重新一字一句地審讀經典大書，對我們來說越來越重要；也因如此，重新認識晚清民國的轉化，以及接下來百年革命的歷史，對我們來說越來越重要。重溫晚清民初經師大儒的建國理念，並非認為他們提供了現成的答案與靈驗的藥方，而是因為他們開啓了一系列的問題，並且，這些問題在百年後的今天，仍有值得借鑒的意義。

目 錄

專題：經學與建國

- 3 如何建構“民族國家”的分歧
——再論《駁康有爲論革命書》 干春松
- 35 論康有爲之國教論 曾 亦
- 51 政治自覺、教化自覺與中華民族的現代建構 唐文明

經學史論

- 79 劉氏《論語正義》參正 陳鴻森
- 103 聖人無父
——《詩經》感生四篇的詮釋之爭 吳 飛
- 122 “六家”、“六藝”與“一家之言”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新探 李長春
- 147 《韓詩外傳》中的《易》學思想 孟慶楠
- 159 《春秋》學中的董何之異 黃 銘

舊文新刊

- 187 王制通論 程大璋 著 呂明烜 整理
- 204 皮錫瑞南學會講義 皮錫瑞 著 皮迷迷 整理
- 237 徵稿啓事

專題：經學與建國

如何建構“民族國家”的分歧

——再論《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千春松*

章太炎在1903年5月致陶亞魂、柳亞子的信中說，他自己與陶、柳一樣，“曾以紀孔、保皇為職志”，逐漸走上反滿革命的道路。章說：“鄙人自十四五時，覽蔣氏《東華錄》，已有逐滿之志。丁酉（1897）入時務報館，聞孫逸仙亦倡是說，竊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於對山之妄語。”^①也就是說，在1897年前後，章太炎雖然已經具有反滿意識，但是，在策略上依然是接受康有為的改良政治策略。

然而，戊戌變法的失敗，以及由隨之而來的軍事失敗所導致的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等一系列事件，使清政府的合法性資源遭受到嚴重的銷蝕，章太炎的主張逐漸由“革政”轉向“革命”。

1900年6月，他因義和團庚子事變，上書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希望他與清政府決裂而建立新的南方政府，以保全南中國。^②同年7月26日，在上海召開的“國會”活動上，章太炎因為不滿傾向於康有為的唐才常所提出的政治主張^③，憤然“斷髮”，並撰寫了《解辯髮》，並在修訂《嘯書》時，對原先比較具有改良性質的《客帝》和《分鎮》分別撰寫了“匡

* 千春松，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① 章太炎：《致陶亞魂、柳亞廬書》，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19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

② 章太炎說：“某等所望於公者，則明絕偽詔，更建政府，養賢致民，以全半壁，不僅以奮蹈危難期也。”章太炎：《庚子拳變與粵督書》，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145頁。

③ 當時提出的國會的宗旨是“保全中國自主之權，創造新自立國”，“決定不認滿清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請光緒帝復辟”。這三個主張之間的矛盾是明顯的，也體現了保皇黨的內在矛盾，即如何在保皇和否定清政府的合法性之間取得平衡。

繆”，徹底放棄了對於清政府和滿族統治者的最後幻想，從而也明確了他借助種族主義^①的方式提倡革命的路徑。

1900 年之後，中國思想界對於中國前途的思考更為多元化。即使在變革陣營中也開始有了變法和革命的區別。即在革命黨看來，無論是帝黨，還是后黨，均屬於應該被推翻的清王朝，他們所追求的是一個由漢族人領導的新的國家。孫寶瑄對於 1900 年前後中國主張變革的政治勢力，有這樣的描述：“今日海內，黨派有四，曰變法黨，曰革命黨，曰保皇黨，曰逐滿黨。變法黨者，專與阻變法者為仇，無帝后滿漢之見也。保皇黨者，愛其能變法之君，捨君而外，皆其仇敵也。革命黨者，惡其不能變法之政府，欲破壞之，別立政府也。三黨所持，皆有理。惟逐滿黨專與滿人為仇，雖以變法為名，宗旨不在變法也，故極無理，而品最下。”^② 這樣的區別對於我們瞭解 1900 年前後中國政治思想的複雜性有很大的幫助。不過，這個區分不甚嚴密，也反映出許多人思想之間的重合性。比如革命黨和逐滿黨之間、變法黨與保皇黨之間顯然具有較多的重疊共識。儘管這四個選項之間可以產生多種組合，但綜而言之，四派的核心爭議集中於一個關鍵目標：即是通過逐滿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國；還是主張滿漢合體，在光緒的象徵性權威之下，建立君主立憲的政府。

隨後，革命派以一種更為激烈的立場力圖與維新派的君主立憲策略決裂，這樣的態度一方面體現為革命派傾向於以武力鬥爭的方式來推翻清政府；另一方面則體現為章太炎和劉師培等越來越激烈的排滿主張。這樣，無論是革命目標還是革命手段等方面，章太炎與康有為等人的主張的分歧益發明顯，他們之間的正面理論衝突不可避免。

在章太炎和康有為於 1903 年進行那場具有深遠影響的大爭論之前，章太炎與梁啟超之間先期爆發了一場預演式的爭論。這場爭議發生在 1901 年，在

① 沈松橋說：“近代中國的首要關懷，始終便是如何建立一個強固有力的現代民族國家，以應付外在情勢的嚴峻挑戰。為達此一鵠的，以政治國家為指歸的民族主義如何取代以文化國家為歸趣的族類觀念，自為題中應有的當務之急。然而，由傳統的族類觀念轉變為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卻是一段漫長而痛苦的調適過程。”（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載《政治社會哲學評論》，第 3 期，2002 年 12 月，59～60 頁）可以這麼說，章太炎和康有為、梁啟超在 20 世紀最初兩三年內關於滿漢問題的爭論，正是一個由族類觀念轉變為現代民族概念的複雜性的例證。

②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辛丑十月四日，422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被迫“西狩”的窘迫狀況下，清政府的統治能力遭遇前所未有的質疑，更為重要的是，日益增多的留學生群體和新式學生，越來越成為革命勢力的支持者，而他們又擁有了西方的新的理論工具。

新式知識份子群體具有原先士人所沒有的社會批評精神。同時，報紙等新媒體則為他們提供了展示自己批評社會和參與政治生活的平臺。他們直接將政治主張宣示於報紙之上。大眾媒體本身所造成的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則容易導致言論趨向激烈和刺激，比如驅逐滿族、推翻政府的主張，甚至有殺人主義的口號。留學生人數眾多的日本，更成為革命勢力的傳播基地。“庚子以後，東京留學生漸濡染自由平等學說，鼓吹革命排滿者日衆，《譯書彙編》、《開智錄》、《國民報》續紛併起，《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蘇》各月刊繼之，由是留學界有志者與興中會領袖合冶為一爐，革命出版物風起雲湧，盛極一時，在壬寅（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上海《蘇報》案前後，已漸入於革命書報全盛時期矣。”^① 這些日本留學生的雜誌，傳播了大量新的西方政治思想，尤其是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對排滿與保皇的爭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梁啟超的民族主義與章太炎的《正仇滿論》

如前所述，1900年，章太炎逐漸開始脫離康梁的君主立憲立場而主張種族革命。同年，他在對《噶書》初刻本的《客帝》篇所作的眉批中認為這篇文章應“自劾錄”^②，在隨後的《客帝匡謬》一文中，明確指出，“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敵愾，不可得也”^③，認為“種族革命”^④的思

① 馮自由：《革命初期之宣傳品》，見《革命逸史》上，21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② 眉批曰：“余自戊己遘難，與尊清者游，而作《客帝》，棄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終寐而顛，箸之以自劾錄，當棄市。”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110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③ 同上書，111頁。

④ 孫寶瑄的日記就記錄了1900年左右章太炎立足於文字學而形成的種族思想：“枚叔深於小學，力持逐滿之議，以夷狄為非人類，為《說文》西羌從羊，南蠻從蟲，北狄從犬，東貉從豸……然嚮來人多稱東夷、西羌、南蠻、北狄，稱東貉者殊少。如以東夷而論，則《說文》夷從大，大，人也，不得與羊、犬、蟲相比。又云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滿洲處東方，正是東夷，則自古稱仁人，稱君子，豈在當逐之列乎？余素無種族之見，因枚叔善言小學，嚴種類之辨，故即據小學與之爭。”（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辛丑八月初二日，393頁）

想是凝聚人心的重要根據。

也有人提出，章太炎明確其“種族革命”思想可能與秦力山有很大的關係。“此（章太炎的）復仇主張似與光緒二十七年（1901）東京創刊之《國民報》所標榜的‘革命仇滿兩大主義’有密切關聯。創刊《國民報》的秦力山與章炳麟有親密交誼。”^①而由章太炎所作，將梁啟超的《中國積弱溯源論》作為主要論辯對象的《正仇滿論》正是發表於《國民報》第四期。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並沒有因為這個挫折而改變他們基本的政治觀點。這既是康梁對於現實政治趨勢的判斷，也與康有為的社會發展史觀有關。康有為基於公羊三世說而確立的歷史觀，認為中國處於小康世，只適合採用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所以即使在被懸賞緝拿而被迫流亡的情勢下，康有為所採取的策略的第一步仍是“歸政”，即將政治權力回歸到光緒帝這邊。他甚至試圖通過勤王來武力恢復光緒帝的權位。勤王失敗之後，部份康門弟子對於老師的政治目標和策略產生了分歧，康有為則依然故我。

康門弟子中，梁啟超的政治立場複雜而多變。在1902年之前他依然追隨康有為的政治主張，以光緒帝的“歸政”作為他們的政治目標。從他當時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到，其改革中國的政治理想與光緒帝復辟是緊密相連的。所以，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其創辦的《清議報》中陸續發表了《戊戌政變記》、《光緒聖德記》等文，贊揚光緒帝。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至五月，梁啟超寫了《中國積弱溯源論》指出，在國家危難之際，最關鍵的是國民的團結，反對散佈對滿族仇視的言論，並認為中國當下社會之弊在於慈禧與榮祿。一旦光緒帝復政，就可以使中國走出困境。

梁啟超說：“今夫國也者，必其全國之人有緊密之關係，有共同之利害，相親相愛，通力合作，而後能立者也。”並認為有見識的愛國人士，肯定不會仇視滿洲人。站在民權的角度，人民所應該痛恨的是賊民之君，而不論其是漢族或別的民族的君主。“若今上皇帝，非滿人耶？吾戴之猶父母也。故有特識而真愛國者，惟以民權之能伸與否為重，而不以君位之屬於誰氏為重。”^②

^① [日] 小野川秀美：《章炳麟的排滿思想》，見李國祈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250頁，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0。

^②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見易鑫鼎編：《梁啟超選集》，上卷，33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

梁啟超選舉歐洲列國經常會因為君統沒有合適的繼承者，而迎立異國之公族的事例，來說明滿族人作為中國君主的合理性，強調中國積弱的根源不在於異族的統治，而在於國家的“理想”、“風俗”和“政俗”上的缺陷。梁啟超採取了“褒光緒貶慈禧”的方法來描繪晚清的政治變革方嚮，即中國之積弱固然全體國民都有責任，但主要的責任在慈禧，而光緒帝則成為努力掙脫慈禧控制的角色，“忘身捨位，毅然為中國開數千年來未有之民權，非徒為民權，抑亦為國權也”^①。

梁啟超指出，與改良相比，革命將造成巨大的破壞並導致社會危機，因此，改良是中國合理的政治變革方案。他不僅指出洪秀全起義所造成的生民塗炭不亞於法國大革命，同時對平定起義的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也有批評，認為這是國家內部的自相殘殺。他借用俾斯麥的話說：“歐人以敵異種者為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家，歐人所不稱也。”^②

身處日本的梁啟超顯然是敏銳地感受到了仇滿所激發的革命的激情，這種激情經由義和團運動和《辛丑條約》等事件而成為新的社會運動的動力，特別是一直存有排滿心理的會黨與革命思想的結合，使排滿日益成為一種社會思潮。

而從小接受反滿熏陶的章太炎很快接受了種族革命的思想並成為這個思潮的推動者。針對梁啟超這個時期的作品，特別是《中國積弱溯源論》一文，章太炎撰寫了《正仇滿論》（刊於《國民報》，1901年8月10日）來批駁。從內容和具體的理由看，該文都可以被視為1903年康有為和章太炎關於革命的爭論之前奏。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中，章太炎甚至大量地引用了《正仇滿論》中的文字。

在《正仇滿論》中，章太炎指出，他主張革命是由於“理勢所趣”，這實際上是要破解康門所持的公羊三世說的歷史觀。他強調，排滿並非為了報滿洲的私仇，而是順應歷史的潮流。他說，滿族人在漫長的清朝時期對漢族人進行屠戮、焚掠、鉗束，而義和團等事件則表明滿族統治者已經沒有能力統領這個國家走出困境，所以應該通過革命來推翻它。革命乃社會之公理而非漢族之復“私仇”。

在文中，章太炎對梁啟超的主要立論作了批駁。

①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見易鑫鼎編：《梁啟超選集》，上卷，39頁。

② 同上書，37頁。

首先，章太炎指出，光緒帝遠非梁啟超所描述的那種聖主；光緒帝所進行的改革也非真正爲了民權，只是爲了鞏固滿族統治而已。

其次，雖然漢族統治者和滿族統治者中都有“民賊”，然而漢族的士人從來不與滿族朝廷同心，所以，不排斥滿族，要建立國家的凝聚力是不可能的。

再次，對於歐洲各國君統乏嗣，迎立異國公族之事，他認爲這是基於歐人種族和文化發展程度上的相似性而產生的。同時，也有希臘、意大利從土耳其和奧匈帝國獨立的例子，所以，這並不能成爲中國接受滿族統治者的理由。

章太炎進一步說，排滿，並非是誅滿，是讓滿族人回到他們原來生活的東北，而將中原恢復爲漢族的國家，他將之概括爲“保生命不保權位”。這個說法針對的是戊戌前康有爲創立保國會時所提出的“保中國不保大清”的口號，並將這個口號解讀爲康梁並非自始至終支持清朝皇權。章太炎最後說，立憲起於民權，非皇帝一人所能力，因此，立憲與保皇之間存有對立性，康梁的做法是“忠君”意識的體現，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提倡民權。^①

總而言之，章太炎認爲既然滿洲政府既無力抵禦外敵，又難以成爲凝聚民氣之核心，就必須以逐滿爲革命的手段，否則國家終將成爲歐美的奴隸。

二、建立民族國家使命下不同的民族主義立場

章太炎的激烈言論導致他很難在國內立足。1902年2月28日，章太炎第一次逃往日本，住在梁啟超的《新民叢報》社中。這段時期，梁啟超的思想處於激烈的轉變中。因爲革命立場上的接近，章太炎與秦力山、孫中山在東京交往密切，“時香山孫公方客橫濱，中外多識其名者，而游學生疑孫公驍桀難近，不與通。力山獨先往謁之，會余亦至，孫公十日率一至東京，陳義斬斬，相與語，歡甚，知其非才常輩人也。諸生聞孫公無佗獷狀，亦漸與親，種族大義始震播橫舍間”^②。章太炎的種族革命觀念也日漸

^① 參見章太炎：《正仇滿論》，見陳夏紅編：《辛亥革命實績史料彙編——輿論卷》，91～95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

^② 章太炎：《秦力山傳》，見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一），28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成熟。

在這個時期，革命與排滿的口號獲得了一種互相支持的效果，有文章梳理這個過程：

革命排滿思想原起於會黨，由來已久；而革命排滿兩個觀念結在一起，公開號召，收大效者，當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保皇會成立之後。章太炎說：“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其所規劃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命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鄒容《革命軍》序，1903年出版）而梁啟超也認為：“易姓者，固不足為 Revolution，而 Revolution 又不必易姓。……國家變革與王朝革命，其事固各不相蒙。”（《釋革》）當時兩黨言論權威如章、梁者，尚以為排滿與革命非一事，總算經過鄒容把革命“大言之”，纔使革命排滿連在一起。所以國父說：“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期也。”（《孫文學說》第八章）這時國父纔正式揭出革命排滿的旗幟與保皇黨“畫清界限，不使混淆”（國父《敬告同鄉書》，1904年發表）。^①

在將革命與排滿結合在一起之後，孫中山等人的革命黨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與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保皇改良勢力逐步形成分庭抗禮並後來居上之勢。

這個時期的梁啟超，思想上不斷傾向於革命派。他不僅對康有為的孔教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在排滿和革命等問題上，也表現出與康有為不同的態度。1902年4月，梁啟超寫信給康有為解釋他的一些不同的見解，信中說：“至民主、撲滿、保教等義真有難言者。弟子今日若面從先生之誠，他日亦必不能實行也，故不如披心瀝膽一論之。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主義。弟子所見，謂無以易此矣。滿庭之無可

^①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纂：《“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冊，278～279頁，臺北，正中書局，1969（二版）。

望久矣，今日日望歸政，望復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滿朝皆仇敵，百事腐敗已久，雖召吾黨歸用之，而亦決不能行其志也。”

在信中，梁啟超明顯反對康有為一貫所主張的歸政期待，認為即使復辟亦不能從根本上挽救腐敗無能的滿洲政府。梁啟超接著指出康門弟子中傾向革命的人很多，因此希望能在愛國的途徑選擇上“同歸而殊途”。他說“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齒及一字，固屬仁至義盡，至門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愛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似亦不必禁之矣”^①。可見梁啟超希望康有為能容許門下弟子的革命傾嚮。

梁啟超信中所描述的情形大致不差，因為這個時期保皇派主辦的報紙中，鼓吹革命的文章屢見不鮮。在這樣的背景下，康有為在1902年5月連續寫了《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和《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部份刊載於《新民叢報》，並合印為《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雖然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康有為身在海外，但是他對於國內政治動嚮非常瞭解。他希望通過討論種族、國家問題，革命、改良的路徑的差異，充分表達自己在1900年後面對革命形勢高漲的情勢所採取的政治主張，以消除康門弟子在政治立場上日趨多元化的傾嚮。^②

康有為所要面對的是日益激烈化的思想傾嚮和越發濃重的仇恨清朝和滿族人的氣氛。這種氣氛在江蘇、浙江、上海一帶尤其熾烈。1902年中國教育會成立，此時一些在日本留學的學生因思想激進又被驅逐回國。在章

①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8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康有為甚至在1902年6月《致歐榘甲等書》中說，看到他們論革命，“頭痛不可言”，並說自己是決不可能背棄光緒帝的，如果歐榘甲等繼續堅持革命，“惟有與汝等決絕”（《康有為全集》，第六集，352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② 桑兵認為，康有為眼見革命風潮的蔓延，不能以私了的方式來處理，因此，想把對美洲華僑的信寫成公開的“政治宣言”，並有警示門下的意味。原信中有如果不同意他的意見將會被革出康門的言辭，只是在公開發表的時候刪去。原信說：“僕誓奉皇上，有死無二。諸君夙厲忠義，曰有異義者，得無以各報時有非常之論，而誤以為出自僕意故耶？僕自通播海外，與知友門人離群索居，不得講習討論久矣，其或激於回鑾之後，復辟不聞，賊臣柄政，中國無望，怨憤之餘，或生異說，非僕所知。今自由之風既開，求新之說日甚，亦非吾遠隔萬里所能遠制。惟僕開會保皇，矢死靡他，苟非皇上遭變，必不少改宗旨。其各報有異論者，皆非僕之意。即使出自僕之門人之說，若為保皇立憲以達民權自由之旨與僕同者也，吾徒也；若為革命攻滿之說，則與保皇之旨相反，與僕不同者，非吾徒也。即使出自僕門，或已有盛名，親同患難者，既為異論，即與僕反，諸君切勿以為僕之意也，勿聽之也。”（《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37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太炎、蔡元培和黃宗仰等人的發起下，衆多留學生成立了一個革命組織愛國學社，並不斷有思想激進者如章士釗等加入，使這個愛國學社成為革命思想的傳播中心。加上激進的《蘇報》為陳範所收購，使革命觀點有了一個傳播的平臺。

《蘇報》的言論十分大膽，從《蘇報》案清政府的起訴書的陳述中可以看出其激進的程度。“陳範住三馬路二十號門牌，登報大逆不道，污蔑今上。閏月初五，登《論界說康有為與覺羅氏之關係》；五月二十三，登《滿人九世深仇》；五月初八，登《客民篇》；五月十四，登《讀〈革命軍〉》，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老降小不降，總之驅逐滿人，匡輔真主’；五月初五，登《章炳麟駁康有為書》，交通外人，能得歡心，可使中外子民輕蔑皇上；五月七日，登‘殺人主義即復仇主義，以四萬萬人殺一人，能不快心’。”^① 如果這樣的言論出現在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的刊物中，或許並不會令人詫異，但是，在清朝治下居然直接攻擊皇帝，並主張殺人復仇，其言論之激烈可謂駭人聽聞。其中，尤以鄒容《革命軍》^② 和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為極致。在章太炎看來，《革命軍》雖然理論未見周詳，但是其激烈的言辭恰好是時勢所需。而更為複雜的理論闡述則通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加以展開。這篇文章對當時最為核心的種族主義、政治制度設想等都作出比較明確的說明，因此，可以從理論上對抗依然有很大影響力的康有為。故而，重新梳理康、章的論爭，對於我們釐清雙方對於未來中國的構想，是有很大幫助的。

（一）滿漢問題：夷夏觀念與民族主義的疊加

近代中國所面臨的一個最大困境就是由傳統的天下國家秩序被動地轉向現代民族國家體系。民族國家建構的方式有很多種，由此得出的理論模型也有很多面嚮，比如融合境內多民族而建立一個國族的民族主義，或以單一民族建國的民族國家等。可以說，這幾種面嚮在晚清都有支

① 引自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214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② 《革命軍》的核心主張如下：

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我同胞皆須自認為自己的漢種中國人之中國；不許異種人沾染我中國絲毫權利；所有服從滿洲人之義務，一律消滅；先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中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萬世不復有專制之君主。